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4.06.012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批评与自我批评 优良作风的探索维度及启示*

石学峰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天津 300191)

摘要: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形成发展历程中,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探索中占有突出地位。延安时期,毛泽东主要从功能维度、方法维度、实践维度三个维度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发力性探索。目前,在反对“四风”的新形势下,认真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探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个探索维度,对“四风”问题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探索维度;作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4)06-0087-08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成发展历程中,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功能维度、方法维度以及实践维度探索中占有突出地位。十八大提出: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营造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因而,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探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功能维度、方法维度以及实践维度三个探索维度进行认真研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探索背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强制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统治,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结果断送了原来大好的革命形势,致使苏区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白区的革命力量损失了几乎100%,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

二万五千里长征。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和改弦更张,于是便有长征中遵义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开展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心悦诚服地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方法,纠正了原中共中央领导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地位。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潮并没来得及进行清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王明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他在中共中央的12月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和会议结论,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主张,强调

* [收稿日期]2014-08-18

[作者简介]石学峰(1982—),男,山东省济南市人;法学博士,中共天津市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研究。

“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归根到底,他是要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他的这些错误主张,是在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名义下提出来的,因而曾经迷惑了一些同志,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遵义会议后的中央路线,造成了比较严峻的形势。会后不久,王明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继续推行自己的主张。他甚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和《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件,在组织上闹独立,产生了很坏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经过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但是,王明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1940年3月,他又把他30年代初写的一本书《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延安再版。他在序言中说:不能把昨日之是,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他还说,这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特别需要这些材料的帮助。由此可见,王明硬是要把他那一套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货色拿出来推销,混淆视听,搞乱思想。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方希望八路军在华北发起进攻,牵制日军,以免苏联腹背受敌。实际上,不仅当时八路军无此实力,而且日本内阁已明确表示在苏德战争中恪守中立,因而中共答复苏方:八路军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垮、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苏方对此不满,通过共产国际来电提出15个问题,包括军事和国共关系等要中共答复,含责备之意。王明获悉后,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否定,此时有机可乘,便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许多原则问题为难中央。当时六中全会已时隔三年,他不但不认账,还要翻六中全会的案。这也说明在当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明辨是非,统一思想,实在至关重要,刻不容缓。

1942年,我们党的党员数量已经由1937年的几万人增加到100多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是可贵的,并且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的狭隘性、不稳定性和分散性,决定了他们思想上的主观片面,政治上的左右摇摆,组织上的自由散漫。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造,这些毛病不可避免会在党内生活和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而且他们还会采取各种方法顽强地宣传自己,要求人们按照他们的主张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尤其当我们党处在困难条件下,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尾巴会翘得更高,对党和革命事业会产生很大的阻碍作用。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着重清算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之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帮助全党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理所当然地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整个链条上的主要环节。

二、探索维度

延安时期,毛泽东主要从功能维度、方法维度、实践维度三个维度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发力性探索。

(一) 功能维度

“功能”一词主要表达事物或方法所能发挥有利作用的行为、形式或方式。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功能的发力性探索,成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探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个重要路向纬度。延安时期,毛泽东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功能进行了探索:

1.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实现党的纯洁性的科学方法

始终保持纯洁性是无产阶级政党一贯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和民心所向。但由于我们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党处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包围中,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为党组织的主要来源。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40年7月,共产党员由4万人剧增到80

万人。80万共产党员中,除了极少数为工人党员外,绝大多数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甚至还有大量的地主子弟。这势必造成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的严重不纯,进而对党的性质和生命力造成危害。因此,如何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断消除肌体“毒素”和“杂质”,实现自我净化,切实保证党的纯洁性,就成为当时我们党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此,毛泽东认为,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广大党员和党组织改正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错误,保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1096}

2.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的锐利武器

团结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原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还是无产阶级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始终保持步调一致,亲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形成强大力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和强敌,进而又会进一步促进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巩固、发展和壮大。保持党的团结与统一,就是赋予党旺盛强大的生命;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就是削弱党的生命。延安时期,由于党处在激烈的战争环境和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党内存在非常严重和较为普遍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各自为政状态,这对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党的团结统一妨碍极大。为此,毛泽东非常强调党的团结与统一。怎么实现、保持和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主要提出了这么几条:一是严格执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二是以全党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反对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等;三是提倡顾全大局的原则,清除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四是正确适当地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中,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实现、保持和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中的功能,毛泽东还作了一个非常生

动的比喻,认为它是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锐利武器。他说:“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2]90},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3]359}。

3.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实践的有效方式

“党内民主的实际,就是容许任何不同意见的提出与讨论。”^{[4]660}在党内努力营造一个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鼓励党员在党内生活中自由地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护敢讲真话的同志;提倡党内不同意见民主讨论,普遍地、直接或间接地讨论党内事务;允许党员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等等,都是党内民主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然而,延安时期及其以前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被敌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的或城市地下的斗争环境,分散主义、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等倾向严重存在于许多地区的党组织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这就产生了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的问题。党内民主生活不足,就很难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党克服困难、应对风险,及时化解各种矛盾。鉴于此,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应扩大党内民主。如何扩大党内民主?毛泽东认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扩大党内民主、实践党内民主的重要方式。他说:“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并强调“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3]529}他还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而找到了实践党内民主生活的一个有效方式。

(二) 方法维度

毛泽东曾把方法形象地比喻为桥或船,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2]139}这就非常生动且深刻地说明了方法的极端重要性。延安时期,为了能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功能得到充分而又有效地发挥,毛泽东还对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了发力性探索,这成为毛泽东探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另一个重要路向维度。延安时期,毛泽东认为,就方法而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应做到以下几点:

1.应坚持严肃、诚恳的态度,做到实事求是,按照辩证法行事

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指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必须坚持严正、诚恳态度,坚决杜绝歪曲、敷衍和主观武断态度,做到实事求是,按照辩证法行事。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提议把《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创刊《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由丁玲担任。有一次,丁玲碰到了毛泽东,就以请教的口吻问道:“为什么你在文章中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批评文章,人家会不高兴呢?”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告诉丁玲说:“批评人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毛泽东还特别叮嘱丁玲:“批评人家时,一定要记住。”

怎样才算“实事求是”?毛泽东指出: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必须坚持严肃、尖锐、诚恳态度。他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是“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1]836}他还说:“整风运动之所以产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1]1096}这就是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从客观事实出发,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是一说一,是二说二,不能搞捕风捉影、添枝加叶,更不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怎样才算“讲点辩证法”?毛泽东说:就是“先把人家的长处说一说,并且要说透,然后再对他的错误或缺点进行批评”,他还强调道:“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优点与缺点共生,正确与错误并存,长处和短处同在,是事物本来的辩证法。因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应该讲究辩证法,更多地采用激励式批评、建设性批评,把握好分寸,采取恰当的批评方式方法,真正让批评和自我批评触及其思想深

处和精神内核。

2.要坚持两手都要抓,都要硬,但务必以自我批评为基础

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应该既要抓批评,也要抓自我批评,两手都要抓,都要硬,但务必以自我批评为主。他说:“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5]418}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之所以两手都要抓,都要硬,这是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两者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互相教育与净化和自我教育与净化的统一过程。无论是开展批评,还是开展自我批评,都是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就需要准确地揭露它,这个过程就是批评过程,揭露就是批评。把思想问题揭露出来后,还需要做自我反省、自我净化、自我教育,这个过程就是自我批评过程。没有自我批评过程,就不可能真正认识错误并及时改正错误。所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只强调批评而不重视自我批评,或者只强调自我批评而不重视批评,都是很难最终解决思想问题的。

但是,由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解决思想问题过程中的地位不同等,所以,在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同时,也务必以自我批评为基础。一方面,不做诚恳地自我批评,就很难开展相互批评,更很难容忍来自他人的批评;另一方面,依据唯物辩证法可知,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毛泽东认为,应该务必以自我批评为基础。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就鲜明指出:“马列主义方法论,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6]479}同年11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讲话时又指出:“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1]935}后来,毛泽东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做自我批评。”^{[7]837}这些都说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务必以自我批评为基础。实践证明:只有以自我批评作为基础,别人的批评

才能听得进去,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取得最终成效。

3.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公式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总会犯错误,共产党人也不例外。毛泽东就曾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8]1480}那么,怎么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主张: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这一方针最早是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提出来的。他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1]827-828}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干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再次对这一方针作了阐述。他指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就是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后来,毛泽东还进一步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他说:“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9]210}具体地讲,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把增强团结作为出发点,并经过积极健康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手段,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善意的帮助,并在实际行动中迅速、彻底的改正,从而最终在新的基础之上达到新的团结。

4.坚持既善于抓主要矛盾,同时也应兼顾次要矛盾

延安时期,毛泽东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主次矛盾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这就是:既坚持抓主要矛盾,同时也应兼顾次要矛盾。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还将其转化为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践活动的方法论指导和运用。

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就指出:“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

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2]91-92}

延安整风时期,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由谭政起草后,毛泽东亲自进行了审阅和修改。毛泽东加写了近三千字,其中就指出:不要企图同时改正一切不良的东西,而应集中力量批判最主要的一点,其余就会迎刃而解。还说,应该选择典型,不应该采取平均主义;典型的批评,是最有力量与最有意义的,而平均主义的批评,则是最没有力量、最没有意义的。

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既“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他还特别强调“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8]1442}

总而言之,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必须善于抓住要矛盾,做到“抓大放小”“帮人要帮到点子上”,只有这样,次要矛盾和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与此同时,在抓主要矛盾时,也应兼顾次要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微杜渐和未雨绸缪,避免小问题小错误逐渐转换为大问题大错误。

(三)实践维度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从功能维度和方法维度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有力探索,而且他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力行者,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感人故事。

1.“群众对我有意见,说明我关心群众的疾苦不够啊!”

1941年6月,陕甘宁地区召开现场会,开会时下大雨,一个响雷把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劈死了。噩耗传来,群众舆论纷纷,有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听了这话,询问了情况

后,就把这个人抓了起来,发现是一个妇女。毛泽东认为,这个妇女这么说,肯定是有原因的,就问她,你为什么这么恨我,还要让雷劈死我?农妇说,雷打不死你我烧死你,我烧不死你,水淹死你,反正是活不下去了。毛泽东一听,觉得话里有话,再仔细一了解,是公粮征多了,1938 征粮 1 万担,1939 年征 5 万担,1940 年征粮了 9 万担,1941 年要征 20 万担,农民确实负担重。负担重老百姓生活不好,自然会有怨言,如果照这样下去,再不解决问题,共产党很难在这个地方统治下去,会失掉民心,直到垮台。毛泽东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扩大生产运动。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犯错误,都是难免的,我们都有”,“我们刚到陕北时,征粮多了,老百姓不满意。有个县委书记,打雷时触电死了。有人讲‘雷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当时有的同志主张把他当‘反革命’抓起来。我不赞成,群众对我有意见,说明我关心群众的疾苦不够啊!我当时几夜睡不好觉反复想这个问题,以后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改善了党和人民的关系。”^{[10]57-58}

2. 百团大战“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

百团大战刚刚胜利时,中共中央十分肯定,毛泽东还要求彭德怀有机会再多组织几次。但在 1941 年、1942 年日军大扫荡导致八路军极端困难后,彭德怀却一度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被指责过早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实力以及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等等。对此,彭德怀觉得十分委屈。于是,他决定和毛泽东交流一下意见。一天晚上,彭德怀找到毛泽东,说明来意后,毛泽东非常诚恳地对彭德怀说:“‘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也是同意的了。如果讲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动作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彭德怀的怨气顿时就消失了,他还激动地对毛泽东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

死而无憾了!”^[11]

3. “脱帽,敬礼,赔不是!”

从 1942 年春到 1945 年 4 月,我们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然而,在整风运动后期,由于扩大敌情、错误估计形势,特别是由于康生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大搞逼、供、信,结果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毛泽东及时纠正了这种过火行为,强调不能搞“逼、供、信”,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他还主动承担责任,并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党的七大以及其他一些场合,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敬礼,赔不是”,进行自我批评。例如,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就说:“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还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檐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他还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12]655}许多曾受到过冤屈的同志,最初的怨气虽然很大,但是由于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的赔礼道歉,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对过去的事释怀了,心情重新舒畅了,而且还增加了同志间的感情,增进了团结。

三、启示

当前,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全党正在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中央明确提出要“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工夫”,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所做的功能、方法以及实践三个路向维度的探索,无疑对反对“四风”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反对“四风”问题,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前提是明确其功能

反对“四风”问题,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前提是明确其功能,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探索批评与自我批评给我们留下的一条宝贵经验和重要启

示。当前,反对“四风”问题,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充分发挥以下功能:首先,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洗尘功能。积极、健康、有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是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的有效方法,能够促使党员领导干部重新回到正确的人生轨道上;其次,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和挽救功能。通过恰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方面使犯有“四风”问题的领导干部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真正触及思想和灵魂,达到照镜正容、洗澡除尘、醒脑治病的效果。另一方面,批评者也会反思自己,找出差距,意识到前车之覆乃后车之鉴,从而避免出现类似的失误;再次,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团结功能。对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四风”问题,加以分析,并适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带“病”的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医治”,以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改正错误,从而能够团结更多的同志一起工作。

(二) 反对“四风”问题,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重点是运用其方法

反对“四风”问题,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重点是运用其方法,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探索批评与自我批评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条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当前,反对“四风”问题,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在方法上坚持做到以下几点,这就是:首先,应坚持严肃、诚恳态度,坦诚相见、开门见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客观公允、动真碰硬,绝不能隔靴搔痒、轻描淡写、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更不能遮掩问题、回避矛盾、弄虚作假,真正查摆“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其次,既要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摆正自己的位置,摆对群众的位置,理顺自己和群众的关系,以人为镜,反观自照,经常审视自己、剖析自己、提高自己、净化自己、革新自己,主动“红脸、出汗、治病、排毒”,又要主动把他人摆进去,敢于揭短亮丑,把病毒挖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切切实实“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再次,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出以公心、与人为善、真诚帮助,切忌心存杂念、夹带私货、借机报复、打击整人,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复次,反对“四风”问题,用好批

评与自我批评,需要抓主要矛盾、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言,官僚主义是主要矛盾,没有官僚主义者,就不会有形式主义者挖空心思制造形式;就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而言,享乐主义是主要矛盾,没有享乐,就不会有奢靡。所以,应该紧紧抓住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两个主义不放,其他两个主义也就迎刃而解。

(三) 反对“四风”问题,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是领导干部做表率

反对“四风”问题,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是领导做表率,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探索批评与自我批评给我们留下的又一条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反对“四风”问题,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主要原因则是很多领导干部不能做到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现实生活中,很多领导干部要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要么心胸狭窄、唯我独尊、闻过则怒、闻过则跳、堵塞言路、打击报复、只许摘花、不许种刺,这就很难使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效盛行起来。因而,反对“四风”问题,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是领导干部做表率,这就要求做到以下几点:首先,领导干部要提升自己的党性修养,坚持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讲真理不讲面子,胸襟开阔听批评,严于律己作批评;其次,领导干部要培养民主作风,广开言路,让人讲话,听人批评,既听喜也听忧,绝不能以权压人、以势压人、借机泄私愤、打击报复;再次,领导干部要树立刮骨疗伤、洗心革面的决心以及壮士断腕的勇气,带头无情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向自己开炮;最后,要探索建立公开、透明、可操作性强的监督机制,对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领导干部要给予正当奖励和鼓励;对掩盖矛盾、弄虚作假、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领导干部要督促改进;对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领导干部要严格按照党纪严肃处理。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7]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0] 孟庆春.跟毛泽东学凝聚人心[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 [11] 顾阳.延安整风中的历史细节与批评智慧[J].人民论坛,2013(31).
- [12] 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朱德东)

Exploration Dimensions of Mao Zedong on Fine Style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n Yan'an Period and Its Enlightenment

SHI Xue-f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Teaching of CPC, Tianjin Municipal Committee School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ne style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the exploration of Mao Zedong in Yan'an period on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took prominent position. In Yan'an period, Mao Zedong made the forceful exploration on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mainly from such three dimensions as the functional dimension, approach dimension and practice dimension. Currently, under the situation of anti-"four-adverse-style", the careful study of Mao Zedong in Yan'an period on the exploration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s of importantly real enlightenment on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 thorough examination and rectification, and a thorough elimination for the "four-adverse-style".

Key words: in Yan'an period; Mao Zedong;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exploration dimensions; working style construction